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德】柯兰霓 著 李岩 译 张西平 雷立柏 审校

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

P. Joachim Bouvet S.J.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德】柯兰霓 著 李岩 译 张西平 雷立柏 审校
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

P. Joachim Bouvet S.J.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德]柯兰霓著;李岩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1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978 - 7 - 5347 - 4929 - 2

I. 耶… II. ①柯…②李… III. 白晋—生平事迹
IV. B979.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1985 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

作 者 [德]柯兰霓

译 者 李 岩

审 校 张西平 雷立柏

责任编辑 王莉娜

责任校对 李接力 朱志远

封面设计 陆智昌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25号 邮政编码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37千字

定 价 25.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12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纪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

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录,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新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录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中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必须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文化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 年 5 月

出版说明

清代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的历史文献在清代的外文文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不仅研究西方汉学若不从此入手,就无法掌握和真正了解西方汉学的来龙去脉及其知识演化和变迁的内在原因,同时,研究中国明清基督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若不掌握入华传教士的相关文献,也无法进入其历史的内核。多年来,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停留在“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上,直接研究外文原始文献和档案的较少,翻译出版的史料也很有限,这或许是该领域的研究总是进展缓慢、鲜有创造的一个原因。

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大象出版社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合作,自1999年起组织出版了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研究书系”丛书,从基本文献的翻译入手,分三个系列向国内读者介绍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本书系已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五”期间重点图书出版项目,目前已陆续出版十余种。在继续致力于这一书系组织出版的同时,为配合国家清史文献的整理出版,我们将部分有关清代传教士著作和文献的译著,从这套书系转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编译丛刊”中出版,特此对读者诸君作一说明。

学术乃天下公器。清史纂修,世纪大事,我辈能参与其中,为之尽心,足矣!

大象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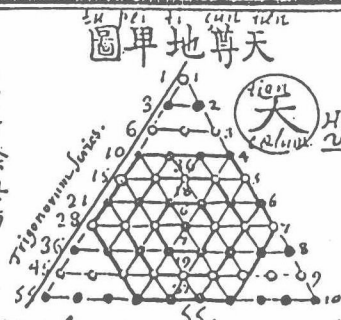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2004年6月

*Fons numerorum figurarum
servientium computis Arithmeticae formalis 97
et symbolicae*

易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
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
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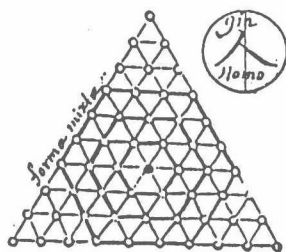


Hexagg.
vaci.
36
18
6

Hexagg.
pleni.
37
19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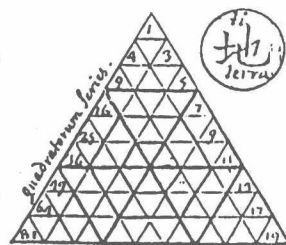
易傳參天兩地而倚數紐奇圓圓三耦方圓四
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者徑一而圍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聖人德
配天地能陰能陽能柔能
剛能圓能方



Fons figurarum mixtarum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Fons omnium figurarum terrestrium, quales sunt quadrata & gubiles

夫子云九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

作者自序

法国耶稣会神父白晋的作品或许是过去二十年里最激动人心的发现之一。这位年轻的、甚至有些稚嫩的耶稣会士是在 1685 年作为“国王的数学家”之一被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在那里他完成了自己生命中重要的转变。这位为了扩大法国在远东地区影响而赴华的年轻的自然科学家，前往暹罗的途中如一个孩童般好奇地观察着新鲜的昆虫和鱼类，只是偶尔才思考一下传教的事情，而传教本来是他的主要任务。到达中国后，白晋和他的修会兄弟张诚 (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 被安排与葡萄牙的传教士们住在一起。那时候，传教士当中的一些派系纷纷试图使自己成为皇帝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向皇帝阐释教义，以期改变皇帝，并最终促成其归信。

白晋后来作为康熙皇帝的使者被派往欧洲，这次旅行促成了他内在的转变，回中国对他来说如同回家一般。在途中他研究了 1693 年严当 (Charles Maigrot, 1652—1730) 的禁令，并且由此开始深入钻研中国的古籍，尤其是“变易之书”——《易经》。看来，这位年轻的自然科学家此时似乎开始转变成一位神学家，通过对欧洲和中国的语言及神话传说进行比较，他创立了一种崭新的、独特的体系——索隐派，即将一些图片、形象和思维方式进行融合而产生一种跨越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今天被称为“跨文化”的体系。而这一体系向欧洲人

和中国人指明了他们各自的和共同的源起,年轻的法国传教士由此成为了一个“世界公民”。

耶稣会“适应策略”的终结也标志着索隐派发展的结束。向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君主去阐述——根据索隐派的观点,他本来就是一个基督徒——中国古代典籍只不过是基督宗教教义的补充和扩展,这样的阐述看来太过危险。白晋的跨文化思想大厦在基督教科学派(Szientismus)看来有些过时。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它却是无比进步的,其中包含了跨越两种互相补充和平等的文化的神学。作为自然科学家的白晋还将数学引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白晋视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他的通信伙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以及他最重要的“弟子”——康熙皇帝为榜样。令人遗憾的是,白晋的大部分索隐派作品仍然没有被研读过,这些手稿在档案馆里尘封已久。但他及其索隐派思想在过去的几年里所经历的“复兴”,让人看到了不久的将来改变这种状况的希望。最好是由中西方的学者们共同研究和出版白晋所留下的作品,这肯定也符合他本人生前的心意。

在这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一书的翻译,这证明,索隐派思想在中国找到了“支持者”。在张西平教授的指导之下,李岩女士承担并完成了翻译该书的艰苦工作,将索隐派思想译回了中文,此举十分令人钦佩与赞赏。该书不仅介绍了白晋的生平,还包括很多非常复杂的对索隐派以及基督宗教专题的论述,这些思想堪称东西方共同的文化遗产。我衷心地希望,白晋的思想在三百年之后仍然能够觅得“知音”,并且在长时间尘封之后对当代产生积极的影响。

柯兰霓(Claudia von Collani)于中国丙戌年

中文版序

张西平

对明清入华传教士的研究近年来有了很大的进展,中国学者充分利用熟悉中文文献方面的长处,在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只要提一下台湾黄一农先生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和汤开建先生的《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就足以说明问题。但如何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推进我们的研究仍是一个有待加强的方面。因为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事业,它是一个在多国别、多学科,以多种语言形式同时展开的学术领域。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经先后翻译了一些汉学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著作,^①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则注重传教士经典文献的翻译,经过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果。^②

① 钟鸣旦:《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史景迁:《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柯毅霖:《晚明基督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② 近年来我们和大象出版社合作,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关图书,如:爱德华·卡伊丹斯基著,张振辉译:《中国的使臣卜弥格》,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年。
汤森著,王振华译:《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
严嘉乐著,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
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
G. G. 莱布尼茨编,梅谦立[法]、杨保筠译:《中国近事》,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安文思著,何高济、李申译:《中国新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
李明著,郭强、龙云、李伟译:《中国近事报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

对于那些对在清代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传教士的研究著作我们更是给予很大的重视。比如,我们组织翻译了魏若望先生的《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①比利时学者高华士的《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②,丹麦已故学者龙伯格的《马若瑟——中国语文学与索隐派》,还有这本德国学者柯兰霓的《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一书。在柯兰霓教授的这本著作的中文版出版之际,我想将我的一篇关于白晋的研究文章作为这部著作的导读,以有助于读者对白晋其人其成就的深入了解。^③

在康熙的直接安排下,法国入华传教士白晋等人对中国的《易经》进行了长达五年多的研究,这是清前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部分研究,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白晋研究《易经》的中文原始文献尚未公布,从而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处在若明若暗之中,许多问题还未解决。本文依据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白晋读《易经》的原始文献,并吸取近年来国内外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对通过《易经》研究在康熙和白晋之间所展开的文化对话做一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① 魏若望著,吴莉苇译:《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

② 赵殿红译:《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

③ 此文发表于《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页74—85。

一 康熙安排白晋等人研究《易经》的基本历史情况

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是首批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到北京后和张诚一起在官中为康熙服务,深得康熙宠爱。白晋很早就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1697年返回法国,在巴黎做讲演时他曾说“中国哲学是合理的,至少同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样完美”;《易经》这本书“蕴涵了中国君主政体的第一个创造者和中国第一位哲学家伏羲的(哲学)原理”^①。这说明,此时白晋已经研读《易经》,并认识到《易经》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六年后,即康熙四十二年(1703),白晋写出研究中国典籍的著作《天学本义》。^②他在自序中提到《易经》时说:“秦始皇焚书,大《易》失传,天学尽失。”并表明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恢复天学。该书上册是《择其解益明经书系天学之本》,下卷是《择集士民论上天公俗之语》,^③如韩荃在给白晋《天学本义》所写序中说的:“此书荟萃经传,下及方言俗语,其旨一本于敬天。”^④

目前发现的康熙安排白晋读《易》最早的文献是这样记载的:

① 转引自林金水:《〈易经〉传入西方考略》,载《文史》第29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页367。

② 白晋的《天学本义》分别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和罗马梵蒂冈教廷图书馆, Maurice Courant 所编的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épartement des Manuscrits 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areens, japonais, etc* 的第7160号,7163号为《天学本义》;《天学本义》的另一版本为《古今敬天鉴》(两卷),编号为7161号;罗马梵蒂冈教廷图书馆分别有两个目录,一个是余东所编的 *Catalogo Delle Opere Cinesi Missionarie Della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XVI—XVII*,《天学本义》的编号为25—1;由伯希和(Paul Pelliot)所编,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整理的 *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rimé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天学本义》的编号为 Borg. Cinese. 3。

③ 梵蒂冈图书馆 Borg. Cinese. 316(14)《天学本义》白晋自序。

④ 梵蒂冈图书馆 Borg. Cinese. 316(14)《天学本义》韩荃序。

四月初九日,李玉传旨与张常住:据白晋奏说,江西有一个西洋人,曾读过中国的书,可以帮得我。尔传于众西洋人,着带信去将此人叫来。在白晋画图用汉字的地方,着王道化帮着他略理。遂得几张,连图着和素报上,带去。如白晋或要钦天监的人,或要那里的人,着王道化传给。钦此。^①

据学者考证,这份文献的时间应是在康熙五十年(1711)。^② 傅圣泽进京后和白晋一起研究《易经》,康熙对他的研究情况也十分关心。傅圣泽曾奏:

臣傅圣泽在江西聆听圣旨,命臣进京相助臣白晋同草《易经》稿。臣自愧浅陋,感激无尽。因前病甚弱,不能陆路起程,抚院钦旨即备船只,诸凡供应,如陆路速行于六月二十三日抵京。臣心即欲赶赴行宫,恭请皇上万安,奈受暑气不能如愿,惟仰赖皇上洪福,望不日臣躯复旧,同臣白晋竭尽微力,草《易经》稿数篇,候圣驾回京,恭呈御览。^③

在白晋研究《易经》的过程中,康熙十分关注,多次问及此事。

七月初五日,上问:“白晋所释《易经》如何了?钦此。”王道化回奏:“晋现在解《算法统宗》之攒九图,聚六图等因具奏。”上谕:“朕这几个月不曾讲《易经》,无有闲着;因查律吕根原,今将黄

① 此原始文献有两份抄本,个别字略有不同,如其中一份将句中“料理”写成“署理”,将“或用那里的人”写成“或要那里的人”。阎宗临选了其中没有涂改字的文献。梵蒂冈图书馆 Borg. Cinese. 439(b),参见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169;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页281。

② 江西巡抚朗廷极在康熙五十年五月十五的奏折中,提到将送江西的传教士傅圣泽进京。罗丽达对方豪所讲到的有关白晋读《易》的十份文献做了很好的研究,见罗氏著:《白晋研究〈易经〉史事稽考》。

③ 梵蒂冈图书馆 Borg. Cinese. 439(a),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册,页281。

钟等阴阳十二律之尺寸积数,整音、半音,三分损益之理,俱已了然全明。即如箫笛、琵琶、弦子等类,虽是玩戏之小乐器,即损益之理也,查其根原,亦无不本于黄钟所出。白晋释《易经》,必将诸书俱看,方可以考验。若以为不同道则不看,自出己意敷衍,恐正书不能完,即如邵康节,乃深明易理者,其所有占验,乃门人所记,非康节本旨,若不即其数之精微以考查,则无所倚,何以为凭据?尔可对白晋说:必将古书细心较阅,不可因其不同道则不看,所译之书,何时能完?必当完了才是。钦此。”^①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康熙不仅自己认真研究中国传统的数学、律吕和《易经》的象数之学,而且对白晋提出告诫,“不可因其不同道则不看”,也不要敷衍了事。

傅圣泽进京后和白晋一起研究《易经》,两人随时将学习的情况向康熙汇报,^②梵蒂冈图书馆藏的一份文献说明了这一点。

有旨问臣白晋,你的《易经》如何?臣叩首谨奏。臣先所备易稿粗疏浅陋,冒渎皇上御览,蒙圣心宏仁宽容,臣感激无极。臣固日久专于《易经》之数管见,若得其头绪尽列之于数图,若止臣一人愚见,如此未敢轻信。傅圣泽虽与臣所见同,然非我皇上天资聪明,唯一实握大易正学之权,亲加考证,臣所得易数之头绪不敢当,以为皇上若不弃鄙陋,教训引导,宽假日期,则臣二人同专心预备,敬呈御览。^③

① 梵蒂冈图书馆 Borg. Cinese. 439(a), 原文献有两个抄本,文献中有“亦无不本于黄钟所出”句,阎本和方本均改为“亦无不本于黄钟而出”。参见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170;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册,页282。

② 参见 John Witek,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quet, S. J. (1665—1741)*, p. 202.

③ 梵蒂冈图书馆 Borg. Cinese. 439(a)。此文献阎宗临未抄录。

《易经》为六经之首,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读懂它并非易事。白晋在给康熙的奏书中也道出其苦衷。“臣系外国愚儒,不通中国文义。凡中国文章,理微深奥,难以洞澈,况《易经》又系中国书内更为深奥者,今蒙皇上问及所学《易经》如何了,臣等愚昧无知,倘圣恩不弃鄙陋,假年月,容臣白晋同傅圣泽细加考究,倘有所得,再呈御览,求圣恩教导,谨此奏闻。”^①

白晋向康熙奏报二人在《易经》研究上遇到的困难,希望康熙“教训引导,宽假日期”,亦说明康熙对白晋等人研究《易经》的细节非常注意。

白晋作为索隐派的主要成员,在“礼仪之争”中处于很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反对严当代表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等派别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另一方面,由于想推进和坚守利玛窦的思想和主张,从而和耶稣会的原有思想和路线也产生矛盾,白晋曾向康熙奏报:

臣白晋前进呈御览《易学总旨》。即《易经》之内意与天教大有相同,故臣前奉旨初作易经稿,内有与天主教相关之语。后臣传傅圣泽一至,即与臣同修前稿,又增几端。臣等会长得^②知,五月内有旨意,令在京众西洋人同敬谨商议易稿所引之经书。因^③寄字与臣二人云:“尔等所备御览书内,凡有关天教处,未进呈之先,当请旨求皇上谕允其先查详悉。”臣二人日久专究《易》等书奥意,与西土秘学古传相考,故将己所见,以作易稿,无

① 梵蒂冈图书馆 Borg. Cinese. 439(a), 原文献中有“假年月”句, 阎本和方本均改为“假半月”。

② 阎宗临和方豪写为“通”, 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册, 页 282—283。

③ 原稿有“会长”二字, 后删去。

不合于天教，然不得不遵会长命，俯伏祈请圣旨。^①

这件事实际上涉及耶稣会内部在“礼仪之争”中的矛盾，白晋为证明利玛窦路线的正确性，采取索隐派的做法，认为中国的《易经》等古籍中就有神迹。教区的反对派则认为白晋走得太远了，如果照白晋的理解，中国倒成了天学之源。所以，要求对白晋所有上交给康熙的文稿都要进行审查。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罗马教权对中国皇权的一种挑战，无疑会使康熙很反感。^②

随着“礼仪之争”的深入，梵蒂冈和康熙的矛盾日益加深，入华传教士内部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康熙逐渐失去了对白晋研究《易经》的兴趣。

五十五年闰三月初二日，为纪理安、苏霖、巴多明、杜德美、杨秉义、孔禄食、麦大成、穆敬远、汤尚贤面奏折，上将原奏折亲交与纪理安等。谕赵昌、王大化、张常住、李国屏、佟毓秀、伊都立尔公同传于白晋、纪理安等所奏甚是。白晋他做的《易经》，作亦可，不作亦可。他若要作，着他自己作，不必用一个别人，亦不必忙，俟他作全完时，再奏闻。钦此。^③

尽管如此，康熙仍很宽容，让白晋继续进行《易经》的研究。

① 梵蒂冈图书馆 Borg. Cinese. 439 (a-h)，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册，页282—283。

② 白晋在这里讲的会长是谁？罗丽达认为是意大利耶稣会士骆保禄，韩琦指出不是骆保禄，而认为是殷弘绪，这仍不正确。因为此时殷弘绪是来华耶稣会的法国总会长，让白晋和傅圣泽将所有送给康熙的研究《易经》的文稿，也要送给会长看的指令是他下的，但具体去落实这一指令的是法国在华耶稣会北京教区的会长龚当信。也就是说，给白晋写信并具体审查他给康熙的书稿的人是龚当信，而不是殷弘绪。而且殷弘绪1711年在江西，他1722年才到北京。参见 John Witek,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cois Fouquet, S. J. (1665—1741)*, pp. 176-179;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页550；罗丽达：《白晋研究〈易经〉史事稽考》。

③ 梵蒂冈图书馆 Borg. Cinese. 439 (a)，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册，页285。